

現代中國史學中「國史」實作意義的轉變：

從章太炎到錢穆

宋家復*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

摘 要

本文以 1930 年代章太炎 (1869-1936) 與錢穆 (1895-1990) 的一場對話為焦點，分析這兩位先後成為「國學大師」的學者僅有一次的會面的論述內容及其脈絡，指出「國史」的未來乃是兩人一致的關心點，但是兩人對於所謂國史的看法、態度與具體作法已經大相逕庭，走上不同的道路。存在於兩者之間的差異，固然與兩人的年齡際遇、所代表的世代以及時代的變遷有關，但最重要的，是反映了兩人面對已經不可避免的國史及其西方他者的互相界定關係，兩人態度與自覺性的不同。從章太炎到錢穆，一個中西古今的複雜比較觀點已經悄悄浮現在現代中國「國史」的論述與書寫實踐之中，由官方主導的正版歷史樣本轉變成為國內外肯認戰爭 (war of recognition) 的重要戰場。

關鍵詞：國史，肯認戰爭，轉移，整體化，中國通史，史學史

* 作者電子郵件信箱：cfsung@ntu.edu.tw

一、前言

余詢太炎，近見報上中央政府有聘先生赴南京任國史館長消息，確否。太炎答，我與政府意見不相洽，焉得有此事。報章傳聞不足信。余又言，儻果政府來聘，先生果往，對此下撰寫新國史有何計畫。太炎謂，國史已受國人鄙棄，此下當不再需有新國史出現。余曰，此姑弗深論。儻有新國史出現，較之前二十五史體裁方面將有何不同？太炎沉默有頃，曰，列傳與年表等當無何相異。惟書志一門，體裁當有大變動。即如外交志……食貨刑法諸門亦皆然。¹

這段對話如果真的發生的話，大概是在 1934 年的蘇州，² 對話者一方是半退休的革命元老、資深學者章太炎 (1869-1936)，另一方是年輕的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錢穆 (1895-1990)。兩人相差二十五歲，都來自於江南地區，³ 這可能是兩人唯一一次的親身會談。上述對話紀錄出自錢穆單方面的回憶，有學者懷疑這場對話或許只是記憶誤植，甚至主觀想像。⁴ 假設這場對話真的發生在 1934 年左右，當時

¹ 這一段對話是根據錢穆的回憶，參見錢穆，《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合刊·師友雜憶》（臺北：東大圖書，1983），〈北京大學附清華大學及北平師範大學〉，頁 159-160。這一段對話有另一個稍有不同的版本記錄在錢穆 1953 年為朱希祖 (1879-1944) 的《史館論議》所寫的序言中，參見朱希祖著，朱倓、羅香林編，《史館論議》（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78），頁 1-7。朱是在章太炎的弟子中學界地位最為崇高的史學家。錢穆受到羅香林 (1906-1978) 的邀請為這份朱希祖死後出版的手稿寫序，朱希祖是羅香林的外舅，羅同時也是與錢穆同樣任職於香港新亞書院的史學家。

² 錢穆沒有明確指出拜訪章太炎的日期。奇怪的是大部分的章太炎當代傳記既沒有提及這一場錢章會談，也沒有提及關於章太炎作為國史館館長候選人的新聞報導，只有在 1941 年出版於 1941 年的簡短編年傳記中，這一則新聞報導被列在 1934 年。高景成，《章太炎年譜》（原刊北京：燕京大學國文學會，1941），後收入周康燮編，《章炳麟傳記彙編》（香港：大東圖書公司，1978），頁 233-247。章太炎嫡長孫章念馳倒是有提到這件聘任國史館長事件。章念馳，《我所知道的祖父章太炎》（臺北：聯經出版，2016），頁 111。

³ 章太炎來自浙江省的餘姚；錢穆來自江蘇省的無錫。或云晚清學風，「江蘇較為持舊，而浙江較為趨新」，亦可作為大範圍脈絡的參考。王汎森，《近代中國的史家與史學》（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0），〈錢穆與民國學風〉，頁 146。

⁴ 汪榮祖曾經訪談錢鍾書 (1910-1998)，追問錢穆與其父錢基博 (1887-1957) 是否確屬同族親輩，得到與錢穆晚年自傳中所述不同的認知，因此認為錢穆雖為史家，記憶卻不實。汪榮祖，《槐聚心史：錢鍾書的自我及其微世界》（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4），頁 124-125。不過，若是後人的認知值得納入考慮，那麼羅香林—朱希祖—章太炎一脈相傳的親近關係（如註 1 所顯

章太炎已經幾乎完全棄絕政治活動，並且已經被廣泛認定為國學大師，後面這個尊稱固然有實至名歸的成分，卻也有部分可以歸因於他主要的政治與思想對手，像是廖平（1852-1932）、康有為（1858-1927）、梁啟超（1873-1929）、以及孫中山（1866-1925）都比他早逝。會談另一端的錢穆，則剛剛結束了近二十年（1912-1930）的地方中小學教學生涯，並且在知識社群的全國舞臺上以熠熠新星之姿冉冉升起，之所以能夠獲此成就的原因之一，是他在若干章太炎世代的知名學者辭世之後隨即提出異見與批判。雖然章、錢兩人在思想與文化的大方向上都趨近於保守，存在著某種選擇的親和性，但是這場歷史性的會面，即使在單方面的紀錄顯示下，一開始似乎並不順暢。章氏的態度明顯有所保留，無意暢所欲言。為何如此？從錢氏紀錄的後見之明來看，我們知道錢氏最終找到破冰的方法，他是如何做到這點？為何「國史」課題被選為談話焦點？雙方分別採取甚麼樣的觀點去逼近這個議題？這次討論在多大程度影響了錢穆後來的多產生涯？在微觀的層次上，本文單純想要理解這場兩位國學大師簡短但富含戲劇性的對話，嘗試將這場對話（即使是記憶建構）放置於適當的脈絡；比較宏觀地講，本文則希望藉由章、錢二氏的對照，釐清「國史」觀念與實作在現代中國文學發展中的演變。

二、章太炎的地位與國史（館）問題

首先，毫無疑問，當這兩位學者初次見面的時候，章太炎在社會地位與年齒尊位上都比錢穆優越得多。至少就中國文人的社交禮儀而言，這兩個因素或許可以說明，章氏在會見錢氏這樣一位晚輩一開始的威重慎言。不過，這樣的描述不僅僅是就社交理由而言，而且更重要地，也符合近代中國史學發展中世代交替的看法。根據余英時的研究，二十世紀前五十年的「中國史學主流」可以區分為兩個世代。第一世代以梁啟超、章太炎與劉師培（1884-1919）為代表，這個世代在世紀之交啟動了史學典範的轉移，由中國中心的朝代正史逐漸邁向進口的國族歷史模式。相對於尋求「國粹」的第一世代而言，比較年輕的五四世代則偏好將他們自己的學術志

示），錢在羅的邀請為文之下批露早年與章會面並且照實刊出，也不妨視為章氏後人的背書。退一萬步講，即使這場會面與對話果真是錢先生晚年的想像建構，如同孔子晚年曾哀嘆吾久已不復夢見周公，亦足以顯示章太炎其人，以及這場想像回憶的會談紀錄中所觸及之史學議題，對於晚年的錢穆意義重大。本文著重在分析這個議題，並兼採其他章太炎晚年暨錢穆史學著作之資料，分析此議題在兩人史學思想發展中之對比變化，這場會面紀錄僅是作為楔子般引言而已。

業特徵描述為「整理國故」，國故聽起來比較價值中立，不帶有粹字所隱含的褒揚甚或懷念意味，因此攝納了五四時代的反傳統氛圍。胡適 (1891-1962) 和他在北京大學的兩位高第，顧頡剛 (1893-1980) 與傅斯年 (1896-1950)，在新興的歷史學家圈子中逐漸掌握權勢，並且與前面第一世代聯手「成功推翻了那種不切實際的傳統中國歷史觀念」。除了這些主流學者之外，在這個余英時相信乃是「（現代）中國史學黃金時代 (1917-1937)」星譜之中，還包括了陳垣 (1880-1971)、陳寅恪 (1880-1969)、郭沫若 (1892-1978) 與張蔭麟 (1905-1942) 等人；以及，不令人訝異地，余氏論文壓軸，梗要式的討論他在香港新亞書院的導師錢穆及其巨著《國史大綱》。⁵ 余氏所列舉著名史家當然並未窮盡，而他所謂「主流」是否成立，也必須取決於對現代中國歷史學界發展狀況所持的廣泛觀點，⁶ 然而，即使我們同意上述余氏的世代區分與地位認定，也必須銘記，錢穆固然在當時驟得大名，但是，不加區別地將他視為第二世代中的成名學者，進而與 1930 年代知識地景中活生生的傳奇人物章太炎並列，可能會犯歷史時空錯置的謬誤。

前引錢穆回憶文中一開始曾提及國民政府提名章太炎出任國史館的消息，就章氏兼具「國學大師」與「革命元勳」的當代聲譽而言，⁷ 這個傳言並非空穴來風。⁸ 事實上，這不是章氏的名字第一次與這個職位被聯想在一起。早在 1913 年，袁世凱 (1859-1916) 就曾以館長一職試圖收買章氏，換取他在政治上的支持，⁹ 但章氏

⁵ Yü Ying-shih, "Changing Conceptions of National History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in Erik Lönnroth, Karl Molin and Ragnar Björk (eds.), *Conceptions of National History*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1994), pp. 155-174. 中譯本見余英時著，何俊編，程嫩生、羅群等譯，《人文與理性的中國》（臺北：聯經出版，2008），〈20 世紀中國國史概念的變遷〉，頁 565-588。

⁶ 對於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史學的發展，其他學者描繪的圖像或多或少不同於余英時。參見劉俐娜，《由傳統走向現代：論中國史學的轉型》（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王學典，《二十世紀中國歷史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李紅岩，《中國近代史學史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

⁷ 章氏的傳記作者、同時也是章氏弟子的許壽裳 (1883-1948) 特別指出這兩項特徵描述。許壽裳，《章炳麟》，收入周康變編，《章炳麟傳記彙編》，頁 7-178。島田虔次 (1917-2000) 在章太炎的案例中更進一步闡釋傳統學者與革命領袖的內在連結。島田虔次，《中國革命の先驅者たち》（東京：筑摩書房，1965），頁 167-271。

⁸ 這個傳言中的職位提供當然是一種政治姿態，南京政府方面，試圖以此緩和與章太炎之間不愉快的關係。汪榮祖，《章太炎研究》（臺北：李敖出版社，1991），〈章太炎與中華民國〉，頁 317-321；Wong Young-tsu, *Search for Modern Nationalism: Zhang Binglin and Revolutionary China, 1869-1936*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 133-140.

⁹ 湯志鈞編，《章太炎年譜長編（增訂本）》上冊（北京：中華書局，2013），頁 454；許師慎編，《國史館紀要（初稿）》（臺北：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1978），頁 32-34。許氏誤將這個事件列在 1912 年。

寧可被軟禁近三年，也不肯接受這個傳統上位及三公的榮耀官銜。不過，二十年後的報導，¹⁰ 中央政府甚至沒有給章氏一個機會去拒絕被收買，南京政府稍後決定老式的國史館將由檔案處所取代，職司運用現代科學方法收藏各式各樣的政府檔案，並限於收藏為止。¹¹ 也就是說，前現代或至少唐代以後相當標準化的中央史館任務——編修前代正史與纂輯當朝國史稿件——不再被認為是政府的正當職權；政府涉入歷史修纂與正典化 (canonization) 這個想法本身受到如此嚴厲的批判，甚至有人認為連政府保存檔案資料的角色都該受到限制，不妨交由學術機關，或者至少像中央圖書館、故宮博物院、中央研究院這些雖然是公立但是相對超然的機關來主其事。¹² 1934 年左右，顯然主張廢除或至少大幅修減國史館角色的人士在復館與否的爭議上佔了上風，不過，就國史館作為一個機構在現代史上的起起落落而言，這次爭議只是長期連續劇的其中一集。自從 1912 年民國肇立以來，這個有千年歷史的官方史學機構爭議不斷，時廢時興，在擺盪之間，唯一可以確定的是，現代歷屆政府從未放棄參與歷史學術與教育，然而，作為歷史標準詮釋的「國史」卻再也不曾重新獲得它在帝制中國的特權地位。直到今日的史家們——不論官方或私人、專業或業餘——仍繼續書寫著中國的過去與現在，但是他們的書寫對象乃是相對於外國史的中國史或本國史，而不再是具有正史意義、傳統上由國家經營管理具有高度權威的國史。¹³

我們無從確定章氏對於南京政府內國史館爭議內情是否得悉，所以不容易分辨

¹⁰ 經查，1934 年 4 月 3 日上海《申報》確有專電宣稱：「國史館館長，有擬以章太炎充任說」，可見錢穆的回憶並非全無所本。章太炎對於《申報》的「假新聞」的不滿，曾在同年 10 月 16 日形諸文字，去函更正：「閱貴報十五日登北平十四日專電稱，章太炎今日到平，稍勾留仍返滬等語，鄙人近在蘇州講學，並未出門一步，此專電從何而來，望即更正為要，章炳麟鞠躬。」〈國史館館長，有內定章太炎說〉，《申報》（上海），1934 年 4 月 3 日，第 2 張第 8 版；〈章太炎來函〉，《申報》（上海），1934 年 10 月 16 日，第 3 張第 10 版。

¹¹ 許師慎編纂，《國史館紀要（初稿）》，頁 90-98；李祚明，〈「國立檔案總庫」與「國史館」〉，《檔案與建設》，3（南京：1988），頁 55-58；劉永祥，〈民國時期國史館的變遷〉，《學術研究》，2（廣州：2015），頁 119-124。

¹² 許師慎編纂，《國史館紀要（初稿）》，頁 94-95。特別值得注意 1934 年 4 月 28 日的一場「重設國史館審查會紀錄」，傅斯年代表中央研究院出席。

¹³ 儘管如此說，然而，由於無法確定未來是否可能復興這一種官方史學傳統，所以筆者不敢貿然稱呼《清史稿》是中國傳統史學書寫模式的「最後一章」。Chen Hsi-yuan, "Last Chapter Unfinished: The Making of the official Qing History and the Crisi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Historiography," *Historiography East and West*, 2.2 (2004), pp. 173-204. 其實即使在二戰後的世界，也都還有各種形式「國家贊助的歷史」存在。Berber Bevernage and Nico Wouters (eds.), *The Palgrave Handbook of State-Sponsored History after 1945*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8).

當他說「國史已受國人鄙棄」是否有暗指時事的意味。這句過激之詞，也有可能是一位文化保守主義者對新文化運動之後瀰漫的反傳統風氣的制式反應。無論如何，錢穆步步深入的提問，表現了他對相關問題的真誠興趣，這個興趣不在於如何重建國家對歷史書寫的權威，而在於未來如何書寫國族的歷史。退一步思考，錢氏有充分的理由期待，章氏可能願意將他與蔣介石政權的政治歧見暫放一邊，而將出任國史館長的謠傳，轉化視為一個嚴肅的歷史書寫問題。中國史學的未來乃是章氏終身的學術關懷之一，¹⁴ 他對傳承下來的歷史書寫範型似乎也一直採取修正主義的立場。章氏曾經不只一次宣稱：「中國今後應永遠保存之國粹，即是史書，以民族主義所託在是」。¹⁵ 事實上，早在 1902 年，章氏就提出了可能是中國近代史第一份撰寫中國通史的計畫。¹⁶ 章氏的計畫包含下面五部分：

- 一、表凡五：帝王表，方輿表，職官表，師相表，文儒表。
- 二、典凡十二：種族典，民宅典，浚築典，工藝典，食貨典，文言典，宗教典，學術典，禮俗典，章服典，法令典，武備典。
- 三、記凡十：周服記，秦帝記，南胄記，唐藩記，黨錮記，革命記，陸交記，海交記，胡寇記，光復記。
- 四、考紀凡九：秦始皇考紀，漢武帝考紀，王莽考紀，宋武帝考紀，唐太宗考紀，元太祖考紀，明太祖考紀，清三帝考紀，洪秀全考紀。
- 五、別錄凡二十五：管商蕭葛別錄，李斯別錄，董公孫張別錄，崔蘇王別錄，孔老墨韓別錄，許二魏湯李別錄，顧黃王顏別錄，蓋傅曾別錄，王猛別錄，辛張金別錄，鄭張別錄，多爾袞別錄，張鄂別錄，曾李別錄，楊顏錢別錄，孔李別錄，康有為別錄，遊俠別錄，貨殖別錄，刺客別錄，會黨別錄，逸民別錄，方技別錄，疇人別錄，敘錄。¹⁷

¹⁴ 近來有學者撚出「讀史以救世」、「對新史學的批判」兩點來說明章氏一貫的史學思想。王銳，《章太炎晚年學術思想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章太炎晚年思想略論〉，頁 221-242。

¹⁵ 章太炎，〈答張季鸞問政書〉，《制言》，24（上海：1936），頁 1；章太炎著，湯志鈞編，《章太炎政論選集》下冊（北京：中華書局，1977），頁 859。

¹⁶ 趙梅春，《二十世紀中國通史編纂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頁 9-12；楊舒眉，〈1900-1915 年間的中國通史編纂〉，《齊魯學刊》，218（濟南：2010），頁 43-47。

¹⁷ 章太炎，〈中國通史略例〉，轉引自金毓黻，《中國史學史（修訂重排本）》（臺北：鼎文出版

這份計畫中的許多細節值得審視。例如，章氏在別錄（亦即傳記）中收錄的歷史人物別具隻眼，馬上引起讀者注目。例子之一，章氏明顯為了降低孔子的重要性，而將他與另外三位古代哲學家合置於一章之內；同時卻讓多爾袞與康有為各立一章。¹⁸不過，章氏終其一生從未真正展開實現這份略例與目錄，此處本文只想標記兩個要點。第一，這整個計畫的用心在於通貫，而非依朝代分段。第二，章氏震懾於社會學暨社會心理學（特別是 Herbert Spencer 與岸本能武太）的影響，¹⁹將通史的一大部分致力於制度、社會、宗教與心理的發展，這也解釋了他對傳統史學文類像是書志之類的偏好，超過上古／中古／現代這種西方式的斷代。章氏論稱，西方是將歷史區分為接續時代的做法特定適合於學校教科書；然而，在嚴肅的史學討論中，將史料依書志方式安排在各式範疇之下，不受時代限制，比較符合並能夠滿足追求「社會政法盛衰蕃變之所原」的旨趣。²⁰

如果我們比較章氏的《通史略例》與三十年後他對錢穆詢問的回答，很明顯地章氏的史學理念變化不大。章氏對於傳統中國書寫歷史範型及其現代轉化的想法並未做根本的改變，這點在與其同儕學者在相同問題上的平行比較之下，更容易顯示出來。一種歷史負擔感 (burden of history) 在世紀之交的中國知識分子群體之中廣為傳播，這裡的歷史，不僅是就抽象意義的漫長帝國過去而言，同時也指涉物質存在意義之下的巨量史學文本。事實上，正是因為中國文人對於過去歷史的認知經歷了如此重大的轉變，以至於他們不再知道如何對傳統知識分類體系下歸類為史學文

社，1985），頁 361。這份略例原本以附錄的形式出現於章太炎的《噶書》的第二版，章氏之後曾經修改它，最終在準備另一版本的論文集《檢論》的時候刪除了它。《噶書》與《檢論》均可取得於：章太炎，《章太炎全集》第 3 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金毓黻已經注意到這份略例的出版歷史，因而有意地徵引全文，使得他的讀者能夠看到這份資料，他自己在國史館服務的時候，對於徵集編纂史料的構想頗有取法於章氏之處。賈紅霞，〈民國時期金毓黻在國史館的修史活動述論〉，《史學理論與史學史學刊》，1（北京：2017），頁 245-259。

¹⁸ 關於章太炎對孔子以及儒學傳統的批判性立場的討論，參見王汎森，《章太炎的思想（一八六八—一九一九）及其對儒學傳統的衝擊》（臺北：時報文化，1985），第 6 章。本書另有 2012 年 7 月上海人民出版社簡體字版。

¹⁹ 湯志鈞，〈章太炎的社會學〉，收入章念馳編，《章太炎生平與學術》（北京：三聯書店，1988），頁 532-542。事實上，章太炎受到明治時期日文與日譯西方哲學思想的影響，比目前一般瞭解的既廣且深，可參見小林武著，白雨田譯，《章太炎與明治思潮》（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

²⁰ 章太炎，〈中國通史略例〉，轉引自金毓黻，《中國史學史（修訂重排本）》，頁 358。章太炎受社會達爾文主義影響，學界早已周知，李朝津則進一步細膩指出，章氏「以史為界」的民族理論，希望透過歷史尋求民族進化過程中不變的本質。李朝津，《中國近代民族史學探源》（臺北：蘭臺出版社，2014），頁 105-113。不過本文重點不在民族主義史學觀念的探究，而在於如何書寫的實際問題。

獻的巨量資料產生意義。因此，無怪乎夏曾佑 (1863-1924)，第一位西方格式中國歷史教科書的作者，²¹ 以及梁啟超的親密朋友，在他那本著名教科書的序言一開始就承認，雖然對每個人來說歷史智慧有其必要性，但是特別在研究中國歷史的時候「有難言者」。²² 這種「難」的感覺也出現在劉師培《中國歷史教科書》的導論首句之中，²³ 甚至直到 1921 年，梁啟超仍然在他典範性的《中國歷史研究法》一書的開端，以梁氏典型的戲劇化熱情風格吶喊著要求「中國歷史可讀焉？」問題的答案。²⁴ 夏、劉與梁都深深憂慮於傳統中國史學不僅是巨量還有品質的問題，²⁵ 就此而言，他們在他們自己的歷史書寫實踐之中，藉由擁抱西方習作歷史的方式以為出路，可以說是再自然不過了。錢氏自青少年時期開始就緊密地追蹤閱讀他的前輩學者們的著作，所以他清楚地知道，如果他面對的不是堅持傳統紀傳書寫大方向的章太炎，而是夏、劉、梁等其他相對轉向西方（主要經由日本）寫法的現代中國史學第一代的主流學者，提出中國史學的未來這樣的問題，很難想像能夠發揮打開話匣子的破冰功能。就傳統中國史學文類仍然被視為是一個重要並且可思考的議題

²¹ 不過，張越已經指出，到底哪本是中國近代第一本歷史教科書，難說，意義也不大，其實教科書與通史應有差別，而許多早期歷史教科書貌似章節體，實際上多為紀事本末體。張越，〈近代新式中國史撰述的開端——論清末中國歷史教科書的形式與特點〉，《南開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4（天津：2008），頁 74-80。本文上面提到，章太炎已經注意到教科書與史學專著是應該有差別的，並以此論點批評夏曾佑書，不過，他顯然低估了寫作即使他以為相對比較簡單的中國通史教科書的困難，包括章氏本人、梁啟超一生都提出、但未完成中國通史教科書的寫作。

²² 參見夏曾佑為其著作《中學中國歷史教科書》所寫的序言，這本書原本撰寫於 1902 年到 1906 年之間。1933 年商務出版社將書名改為《中國古代史》，因為夏氏並沒有完成這本書，只撰寫到魏晉時代。關於這份文本的研究以其重要性的討論，參見袁英光，〈中國古代史〉，收入倉修良編，《中國史學名著評介》第 3 冊（臺北：里仁書局，1994），頁 299-324。對夏曾佑的全面性研究，參見陳業東，《夏曾佑研究》（澳門：澳門近代文學學會，2001），尤其是第五章。

²³ 該書〈凡例〉首句云：「讀中國史書有二難：……。」劉師培《中國歷史教科書》原本撰寫於 1905 年或 1906 年，後來收入劉師培，《劉申叔先生遺書》第 4 冊（臺北：華世出版社，1975），頁 2463；晚近有單行標點本：劉師培著，萬仕國點校，《中國歷史教科書》（揚州：廣陵書社，2013）。對於劉氏的國粹觀念的討論，參見 Martin Bernal, "Liu Shi-P'ei and National Essence," in Charlotte Furth (ed.), *The Limits of Change: Essays on Conservative Alternatives in Republican Chin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劉氏的生平，參見方光華，《劉師培評傳》（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6）；萬仕國，《劉師培年譜》（揚州：廣陵書社，2003）。

²⁴ 梁啟超，《飲冰室合集》第 10 冊（北京：中華書局，1989），專集 73，《中國歷史研究法》，頁 1。

²⁵ 羅志田進一步論述這個不讀正史、但同時不斷追求擴大史料範圍的詭論現象，在北伐前後的發展。羅志田，《近代中國史學十論》（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3），〈史料的盡量擴充與不看二十四史〉，頁 83-125。

而言，章、錢的對話的確是一場兩代文化保守主義史家之間的跨世代會談，²⁶ 錢氏選擇了恰恰能引發章氏注意與信任的適當話題。

然而，這個撰寫通史該採用何種傳統歷史文類的問題，在第一代現代中國史家之中，已經不是主要共同關心。將梁啟超、章太炎與劉師培連繫在一起的不只是出生世代，更是他們對歷史研究目的的共同看法，三位大師似乎毫無異議地同意並且事實上倡導歷史知識的意識形態功能。²⁷ 他們都相信中國國族過去的統整性，並且透過他們的歷史論述希望建構一個新的中國認同，就此而言，將他們特徵描述為民族主義者應該並不離譜。作為民族主義者，他們不僅預設歷史的主體是國族本身，因而將國族的演化在對國族過去的敘述中視為逐漸展演的終極目的，²⁸ 並且宣示歷史乃是最有效、甚至是唯一界定何謂中國之中國性 (Chineseness) 的途徑。²⁹ 既然，民族主義過去曾是，或許現在仍然是，現代中國意識形態領域中的重大勢力，那麼，到底現代中國史家在實作上，是民族主義情感先行，然後歷史書寫隨之？還是在民族情感用事之前，他們在理智上確曾審慎判定，傳統史學乃是時至今日國族遺產中最值得繼承、最必須繼承的部分？這或許是雞生蛋蛋生雞的循環問題。就心理上而言，現代中國史家與其史學遺產之間總是存在著愛恨交織的複雜關係，章太炎在本文開頭所引對話中，對錢穆的問題的遲疑沉吟，某個意義上，可以被視為一個自我懷疑的時刻，只不過章氏立即將這份自我懷疑的心理「轉移」為

²⁶ 其他心理保守的學者們，像是國粹派，確實對於既有的史學傳統有不滿意之處，但是他們的批評大致上是走向如何透過修正的方式保存這項傳統。Q. Edward Wang (王晴佳), "China's Search for National History," in Q. Edward Wang and Georg G. Iggers (eds.), *Turning Points in Historiography: A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 (Rochester: University of Rochester Press, 2002), pp. 185-208.

²⁷ 吳蔚若，〈章太炎之民族主義史學〉，收入杜維運、黃進興編，〈中國史學史論文選集〉（臺北：華世出版社，1976），頁 946-954。關於梁啟超史學的民族主義傾向，參見汪榮祖，〈梁啟超新史學試論〉，收入杜維運、黃進興編，〈中國史學史論文選集〉，頁 955-968；Tang Xiaobing, *Global Space and the Nationalist Discourse of Modernity: The Historical Thinking of Liang Qichao*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²⁸ 杜贊奇已經對於近代中國史學裡的目的性敘事提出強而有力的批判。Prasenjit Duara, *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 Questioning Narratives of Modern Chin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²⁹ 借用王晴佳的書名來講，就是「透過歷史創造中國 (inventing China through history)」。Q. Edward Wang, *Inventing China through History: The May Fourth Approach to Historiography*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1)。晚清這個創造中國論述，最經典的研究可參見沈松橋，〈我以我血薦軒轅——黃帝神話與晚清的國族建構〉，《臺灣社會研究季刊》，28（臺北：1997），頁 1-77。近年來延續這個中國性課題並加以強力保守回應的，可以葛兆光為代表。葛兆光，〈宅茲中國：重建有關「中國」的歷史論述〉（臺北：聯經出版，2011）。

敵視仇恨投射於無名的「國人」群體身上，³⁰ 這種轉移，稍後在錢穆《國史大綱·引論》中也會看到。

三、與長者交：批判與歡宴

另一方面，章太炎帶有嘲諷的敵意也有可能針對他面前的特定對象錢穆而發，因為錢氏在當時乃是著名地，甚至惡名昭彰地以評鹭前賢得名的不群人物。雖然錢氏晚年被廣泛肯定為中國大陸之外碩果尚存的國學大師，但是，這點不該混淆了下面這個事實，亦即錢氏之所能夠從學術界的邊緣逐步上升至全國舞臺的中心，的確有一部分是由於他對上一世代學者的嚴厲批判。不同於同樣出生於 1890 年代的同輩學者，錢氏既沒有顯赫的家世背景或者出自名師門下（例如陳寅恪、顧頡剛與范文瀾（1893-1969）），³¹ 也從未出國留學（例如胡適、傅斯年、何炳松（1890-1946）與蔣廷黻（1895-1965））。事實上，他甚至沒有高中畢業文憑。³² 固然陶養於江南士人文化的優雅環境之中，³³ 錢氏主要是靠自學成為學者。他早年開始是一位報章雜誌專文或小冊子的博學作者，但要直到 1931 年在新興專業學術期刊上出版《劉向歆父子年譜》才在全國性舞臺上首度出演。³⁴ 這篇小冊般的長文藉著展示康有為所主張劉氏父子偽造儒家群經在事實上根本不可能，止息了晚清以來的今古文之爭，成為分水嶺之作。顧頡剛被這篇長文深深打動，因此邀請錢氏在同一年加入新創設的燕京大學歷史系。時年三十六歲的錢穆自此步入當時中國北方的學術文

³⁰ 應用心理學上「轉移 (transference)」觀念於史學書寫理論研究，可參考 Dominick LaCapra, *Writing History, Writing Trauma*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42.

³¹ 錢穆在回憶錄中曾提及他的幾位學校老師。其中一位後來也變成頗有聲譽的歷史學教授，亦即呂思勉（1884-1957），他的《白話本國史》可能是 1930 早期年代最為廣泛使用的教科書。然而，試圖在呂氏與錢氏的作品之間辨識出任何特定的相似性是十分困難的。關於呂思勉，參見嚴耕望，《治史答問》（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5），〈通貫的斷代史家——呂思勉〉，頁 90-98；張耕華，《人類的祥瑞：呂思勉傳》（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8）。

³² 有一位作者特別點出這個事實來糾正《人民日報》的錯誤。章學良，〈有關著名史學家錢穆三事的辨正〉，收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編，《錢穆紀念文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頁 95-97。

³³ Jerry Dennerline, *Qian Mu and the World of Seven Mansion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8), ch. 3; 王汎森，《近代中國的史家與史學》，〈錢穆與民國學風〉，頁 145。

³⁴ 這本專著原本刊登在 1930 年《燕京學報》第 7 期，顧頡剛當時就是該學報的執行編輯。這本專著一次又一次再版於不同的集子中。本文引用錢穆，《錢賓四先生全集》第 8 冊（臺北：聯經出版，1998）。

化中心。³⁵ 不過，由於個人生涯的調適以及無法接受燕京這所教會大學的高度美式風格，³⁶ 錢穆一年後辭去教職，但是馬上又被顧氏再次邀請加入北京大學歷史系，當時胡適乃是北大文學院院長。³⁷ 基於這兩次的升職，錢氏終身感念於顧氏的慧眼與幫助，即使是錢氏瞭解，他嚴厲批評的對象之一康有為，正是顧頤剛多冊《古史辨》的主要靈感啟發來源。³⁸

康有為並非錢穆的唯一批評目標。作為北大歷史系副教授，錢氏除了兩門系上指定的課程之外，可以另外開授一門自己感興趣的課程。這位年輕的教員大膽選擇了與梁啟超曾經一度教授的同名課程——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³⁹ 由課程講義編纂的專書內容來看，錢氏並未在單一論點上明白批評梁氏，而是在論題上與梁氏針鋒相對。梁氏基本上相信，清代學術具備科學精神，源自於對形上傾向強的宋明理學的反叛；錢氏則論稱，不先瞭解宋明儒學的精義，不可能掌握清代漢學的意義。1931 年錢氏這門課的講演在當時很可能如同一場跨時空的「辯論」，雖然作為辯論對象的前輩學者梁氏並無機會反駁辯護。⁴⁰ 當時這場帶有叛變性質的事件在知識分子圈中所引發的廣泛注意，可以由下述軼事中得見：有一位錢氏的朋友打電話詢問他下周課堂講義中一段引文的問題，錢穆才發現，原來所有人都能夠向大學講義室預約他的講義，所以往往在上課之前，擾攘之聲在有學識的聽眾之間已經醞釀展開。⁴¹

³⁵ 錢氏可能看起來比實際還要年輕，以至於他的同事孟森（著名明清斷代史學者，1868-1937）在第一次見到他的時候，禮貌性地提醒他，作為一名學生不應該在教師休息室閒晃。錢穆，《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合刊·師友雜憶》，〈北京大學附清華大學及北平師範大學〉，頁 153。

³⁶ 例如，錢氏憤慨於下列這個事實，在這所學校甚至連電費帳單都是以英文書寫。同前引，〈北平燕京大學〉，頁 137。關於民國時期學術生活中的英語語言政治 (politics of English)，參見 Yeh Wen-hsin (葉文心), *The Alienated Academy: Culture and Politics in Republican China, 1919-1937*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distributed b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ch. 1.

³⁷ 嚴耕望，〈錢穆傳〉，《國史館館刊》，17（臺北：1994），頁 196-197。

³⁸ 顧氏與康氏以及其他第一代人物在思想上的關係，坦白於顧氏為《古史辨》第一冊所撰寫的自傳性的介紹。然而，在 1920 年代，顧氏已經感受應該擺脫康氏世代的影子的需求，以及尋求新奇的事物。在這個脈絡下，錢穆扮黑臉做了顧氏基於情感上的原因不願意去做的事情，以及對乾枯的古典經學辯論致上最後的致命一擊。顧頤剛編，《古史辨》第 1 冊（北京：樸社，1926），〈自序〉，頁 1-103。

³⁹ 錢穆，《錢賓四先生全集》第 16-17 冊，《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梁氏的文本，收入梁啟超《飲冰室合集》第 10 冊，專集 75。

⁴⁰ 「辯論」是錢穆自己使用的隱喻。錢穆，《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合刊·師友雜憶》，〈北京大學附清華大學及北平師範大學〉，頁 145。

⁴¹ 同前引，頁 142。在那個時候，社會大眾想要取得大學課程的講義材料並不總是那麼容易，倉田武四郎 (1897-1975) 於 1930 年代在北京讀書，在他的日記中便記錄了一個與錢穆的案例相反的例

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書末年表雖然止於 1911 年，正文中最後一章論康有為事實上也包含康氏在民國時期的活動。有一些錢氏博學而聰慧的學生，著眼於這個明顯的不一致，向他們年輕的老師進一步提出一個完全正當的問題：為平衡起見，康氏對頭章太炎難道不也值得一些篇幅？章氏在書中的缺席當然不是因為錢氏知識上的不足，錢氏在此之前的作品中早已顯示他熟悉章氏思想。⁴² 雖然錢氏下面這個想法聽起來有點古板，甚至從現代學術習慣看來落伍，但他真誠地相信書中批評還在世的前輩學者是不恰當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初版於 1931 年，章太炎過世於 1936 年。這種禮節在中國文化傳統中源遠流長。不過，在這個特定案例中，錢氏心目中有其他特別的思想原因——他與章氏之間的思想親近性——使得他避免與章氏直接對立忤逆。這份思想上的親近性間接地表現在 1936 年章氏過世之後，錢氏隨即在燕京大學做了的一場紀念演說。演說中，錢氏首先指出章太炎學術的主幹在於史學，而非經學。這個精心論斷輕易地將章氏從今古文黨派之爭解放出來，並且給予錢氏一個機會去進一步詮釋章氏歷史概念的三個主要特點，亦即民族主義、平民主義與文化主義。如同我們稍後將會看到的，這三個特徵也都出現在錢穆的《國史大綱》。接續這種獨特觀點，錢氏為章氏蓋棺定論：「晚近世稱大師，而真能有民族文化之愛好者，其惟在太炎乎！」⁴³

然而，這幅為章氏所描繪的聖哲畫像並無法掩蓋下面這個事實：錢穆總是嘗試要去超越其直接先行者的局限，以便觸及到達那個最真實的國族過去。只不過在與章氏的複雜關係裡，錢氏花了四十年才將他心中真正的想法和盤托出。1978 年錢氏在獻給中央研究院五十周年專刊的專文中，探討章氏思想的反傳統面向，並且以「立論怪誕」描述章氏思想。⁴⁴ 錢氏所舉論據之一乃是章氏對孔子不敬的態度（記得章氏《中國通史略例》中孔子只得合傳之一的篇幅！），這被錢氏認為是五四時代新文化運動，乃至共產中國批孔運動的先聲。1978 年錢氏對章氏的晚年定論，一方面可以視為是錢氏一生複雜思想發展的衍生結果，另一方面，當然也與 1970 年代中國大陸正在發生的景況有關。不過，考慮到錢氏在 1930 年代以超克康有為與梁啟超而出名，他晚年這個具有高度批判性的人格形象可能反而比較接近在

子。倉石武四郎著，榮新江、朱玉麒譯，《倉石武四郎中國留學記》（北京：中華書局，2002），頁 236。

⁴² 例如《國學概論》(1928) 屢屢徵引章氏。錢穆，《錢賓四先生全集》第 1 冊，《國學概論》。

⁴³ 錢穆，《錢賓四先生全集》第 22 冊，《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八）》，〈餘杭章氏學別記〉，頁 534-535。此文的底稿，應是 1936 年 11 月 26 日錢氏受邀在燕京大學歷史學會之演講，學生紀錄見於錢穆，〈對於章太炎學術的一個看法〉，《史學消息》，1.3（北京：1936），頁 2-7。

⁴⁴ 同前引，〈太炎論學述〉，頁 539。

蘇州會面時章氏所預期的來客性格。任何人若為章氏設身處地，可能也會自問，如同章氏在蘇州會面之前可能會做的一樣：「這位年輕的批評家錢穆為什麼想來見我？我會不會是他下一個出名的墊腳石？」

如同在本文開頭的引文所見，錢穆很聰明地從當時媒體報導中得到啟發，找到話頭，並且堅守在「國史」這個章太炎無法抗拒的議題。最終錢氏似乎贏得了章氏的信任，並且根據錢氏的證言，這場會面持續了幾個小時，並且以一場歡愉的晚宴、伴隨著幾位當地仕紳的賓客作陪才結束。不過，這個人際關係上的和解並不同於思想上的出路。錢氏並未向章氏提及的是（至少我們沒有在錢氏回憶錄中看到），會面一年以前他已經在北京大學隻手承擔下了教授中國通史課程的任務，而這個課程的組織方式與章氏《中國通史略例》有著顯著的不同。這裡使用隻手這個副詞，是取其字面直接的意義，因為這個必修課程原來預定是由十五位各個斷代的專家逐一演講的序列所構成。即使從今天的觀點來看，這種中國全史的導論課程透過集體合作的方式進行也不是壞主意，只要學校能夠找到足夠數目的專家就可以。然而，對錢氏而言這種作法荒謬絕倫，他先是在教務會議上抗議，接著拒絕了某人將十五位講者降低為二位（唐之前錢氏，之後陳寅恪）的妥協式建議，最後乾脆自願自己一個人負責全年課程。⁴⁵乍看之下，錢氏的自我推薦像是一個傲慢的專擅者；不過，一旦將錢氏義憤的反應放回歷史脈絡，我們可能可以更深地體會錢氏的立場。

四、錢穆的「國史」：中西比較觀點的堅持

首先，中國通史被訂為必修課程，先是針對所有文科學生，稍後擴及於所有大學本科學生，乃是國民政府基於意識形態的理由所設定。⁴⁶運用歷史來宣傳國族主義情感或愛國主義，對於二十世紀第一代的中國史家而言，當然不是新聞；但是對於第二代而言，他們醉心於科學歷史的理念，⁴⁷國族主義的意識形態如果不被認為是完全的毒害，至少對於現代歷史專業而言還是不適當的。可是，肇因於日本

⁴⁵ 錢穆，《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合刊·師友雜憶》，〈北京大學附清華大學及北平師範大學〉，頁149。

⁴⁶ 關於「中國通史」進入民國時期大學部課程的建構過程，參見劉龍心，《學術與制度：學科體制與現代中國史學的建立》（臺北：遠流出版，2002），頁216-229。

⁴⁷ Q. Edward Wang, *Inventing China through History*, ch. 3.

侵略以及南京政府的怯懦退縮所造成的一系列國族危機，一再折磨史家的良心，使得即使最具有客觀精神的史家都覺得自己必須要為祖國做些事情，⁴⁸ 所以一個為了「喚醒國魂」的中國通史演講課程，⁴⁹ 伴隨著出版計畫，由傅斯年這位傳說中北大歷史系當時的地下系主任所倡導組織。⁵⁰ 團體合作的工作方式應該也是傅氏出的主意，源自於傅氏心目中所認知的西方劍橋大學出版社系列歷史的範型，⁵¹ 這種斷代專家合作希望構成全史的方式也符合傅氏管理麾下中研院史語所的作法。另一方面，這種團體合作方式可能也與北大歷史系異乎尋常地重視古代史有關，根據當時一位學生的回憶除了錢氏古代史一門必修斷代課程之外，當時系中還有七門課程同樣與古代有關。⁵² 不論如何，以共同計畫課程之名，其實卻是講者各行其是，自由發揮，甚至沒有一份共同課綱。這樣的課程如何能夠喚醒學生的國魂，當然令人高度懷疑。是在這樣的情況下，錢氏身為一位後進的年輕副教授，做出了一人獨挑大樑的英雄式志願行動。

結果，錢穆獨授的中國通史課程成為中國近代大學歷史教育史上一場持續超過十年的傳奇故事。根據一位現場目擊證人的證詞，錢氏的通史教室總是擠滿聽眾，人數多到他有時必須走在學生的桌子上，穿越人群才能到達講臺。⁵³ 在 1938 年對

⁴⁸ Yü Ying-shih, "Changing Conceptions of National History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pp. 172-174. 關於各個案例的詳細情況，參見 Laurence A. Schneider, *Ku Chieh-Kang and China's New History: Nationalism and the Quest for Alternative Tradition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1); Wang Fan-sen, *Fu Ssu-Nien: A Life in Chinese History and Politics* (Cambridge,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⁴⁹ 吳相湘，《民國百人傳》第 4 冊（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9），〈錢穆闡揚傳統文化〉，頁 194。當錢穆第一次講授「中國通史」的時候，吳氏是北大的大學部學生。

⁵⁰ 錢穆，《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合刊·師友雜憶》，〈北京大學附清華大學及北平師範大學〉，頁 147；傅樂成，《傅孟真先生年譜》（臺北：文星書店，1964），頁 33。

⁵¹ 基於這個理由，傅氏相信他必須先在自己的羽翼下培養夠多不同斷代、不同領域的專家，接著一個合作性的「通史」將能正確地呈現。據說傅氏在下列這件事情上惡名昭彰，即禁止他的學生以及年輕教員跨出自己的專業領域。錢穆，《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合刊·師友雜憶》，〈北京大學附清華大學及北平師範大學〉，頁 147；Wang Fan-sen, *Fu Ssu-Nien: A Life in Chinese History and Politics*, pp. 77-80.

⁵² 楊向奎，〈回憶錢賓四先生〉，收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編，《錢穆紀念文集》，頁 3-5。1931 年時楊向奎（1910-2000）是北大大一新生，回憶當時系上除了錢穆古代史必修課之外，另有七門古代相關課程，所以當時的歷史系毋寧說是比較像一個先秦史專業。

⁵³ 李埏，〈昔年從遊之樂，今日終天之痛〉，收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編，《錢穆紀念文集》，頁 10。這個「走在桌子上」的事件發生在 1938 年前後的西南聯大，當時錢穆正在撰寫《國史大綱》。這篇文章亦收於李埏、李伯重，《良史與良師：學生眼中的八位著名學者》（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12），頁 46-64。

日抗戰時期的雲南，一位過去的學生以及年輕同事——陳夢家 (1911-1978) ——向錢氏建議，促成錢氏決定將中國通史的講稿寫成一部大學教科書，結果就是我們今天所看到的《國史大綱》一書。依循錢氏一貫的批判風格，《國史大綱》這部「國族驕傲的豐碑巨作 (monument of national pride)」開頭，⁵⁴ 錢氏就以當頭棒喝的方式要求他的讀者要具備下列信念：

- 一、當信任何一國民，尤其是自稱知識在水平線以上之國民，對其本國已往歷史，應該略有所知。否則最多只算一有知識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識的國民。
- 二、所謂對其本國已往歷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隨一種對其本國已往歷史之溫情與敬意。否則只算知道了一些外國史，不得云對本國史有知識。
- 三、所謂對其本國已往歷史有一種溫情與敬意者，至少不會對其本國已往歷史抱一種偏激的虛無主義，即視本國已往歷史為無一點有價值，亦無一處足以使彼滿意。亦至少不會感到現在我們是站在已往歷史最高之頂點，此乃一種淺薄狂妄的進化觀。而將我們當身種種罪惡與弱點，一切諉卸於古人。此乃一種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譴。
- 四、當信每一國家必待其國民備具上列諸條件者比數漸多，其國家乃再有向前發展之希望。否則其所改進，等於一個被征服國或次殖民地之改進，對其國家自身不發生關係。換言之，此種改進，無異是一種變相的文化征服，乃其文化自身之萎縮與消滅，並非其文化自身之轉變與發皇。⁵⁵

有許多閱讀這份情感豐沛宣言的方式。⁵⁶ 其中之一是將它視為錢氏「國史」觀念的重大表徵性陳述。如同前二點所顯示的，錢氏的國史觀念似乎是由三個特點所定

⁵⁴ Jerry Dennerline, *Qian Mu and the World of Seven Mansion*, p. 66.

⁵⁵ 錢穆，《錢賓四先生全集》第27冊，《國史大綱》，〈引論〉，頁19。

⁵⁶ 余英時曾經在一場公開的演講中提供他閱讀〈引論〉的方式。余英時，〈文化認同與中國史學——從錢穆先生的國史大綱引論說起〉，收入新亞學術期刊編輯委員會編，《錢賓四先生百齡紀念會學術論文集》（香港：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2003），頁437-448。不幸的是這個版本充滿抄寫上的錯誤。黃俊傑則稱錢穆的國史乃作為「民族史詩」。黃俊傑，《儒家思想與中國歷史思維》（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4），〈錢穆史學中的「國史」觀與儒家思想〉，頁223-268。

義。第一，關於國史的知識乃是一個人國民身分的先決條件；第二，國史指涉相對反於「外國」的「本國」；第三，國史作為一種歷史知識必須附有正面情感價值。這三個特點結合起來，證明了錢氏不僅是一位中國本國史的史家，而且是一位具有強烈中國國族主義意識的史家。不過，對於一位像錢穆這樣的批判心靈而言（至少本文所極力嘗試描繪如此），他最不樂見的事情或許就是被不加區隔地與章太炎、梁啟超等前輩史家歸於同類。雖然都在民族主義的通稱大旗之下，錢穆在《國史大綱·引論》之中卻從史學的角度極力批評章氏與梁氏。事實上，上面引文中的第三點所說「偏激的虛無主義」、「淺薄狂妄的進化觀」、「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譴」，雖然並未明言所指為誰，但同樣字彙也都出現在〈引論〉中稍後，錢氏回顧當代中國史學發展狀況、點名提及章、梁二氏的文本脈絡之中，可見錢氏在第三點宣言中實指即為（但不限於）章、梁。

錢穆在《國史大綱·引論》中將現代中國史家們區分為三個主要群體：改革派、傳統派與科學派。章、梁屬於第一類。傳統派自囿於受西方影響之前的治史方式，聚焦於記誦史實與文獻考證。改革派出現於晚清，主要是由亟於造成政治社會變遷的政治行動者們所引介。最後，但當然不是最不重要的派別乃是科學派，源自於胡適的整理國故運動，結晶粹化於傅斯年所謂「治史譬如治岩礦、治電力」這樣的口號。⁵⁷ 傳統派與科學派都侷限在史料的牢籠陷阱之中，並且因此斬斷了歷史與當下現實的紐帶，就此而言，兩派都不得錢氏青睞。不過，即使傳統派可能對於世界並無多大好處，但至少在個人層次上，仍能對於修身明德有所助益；至於史家以科學之名，無端將連續的歷史實體割裂碎化——錢氏從未遺忘或原諒傅斯年在北平大學荒唐的中國通史計畫——終將無所歸依，不知伊於胡底。因此，基於對國族過往之現世影響與系統評價的關心而言，改革派史學很自然地成為塑造通俗中國歷史知識的主要力量。錢氏坦承改革派有所回應於人們鑑往知來的需求，但同時譴責改革派以對國族過往的扭曲觀點誤導民眾。

錢穆認為改革派歷史論證模式的主要謬誤在於化約主義。隨著改革派將中國問

⁵⁷ 再一次，錢穆並沒有點名每個學派的代表人物，但是他卻暗指「整理國故」，這很明顯是胡適的箴言；而礦物學、電子學的比擬，無疑來自傅斯年為史語所學術期刊所寫的著名發刊陳述。傅斯年，〈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收入蔣大椿編，《史學探淵：中國近代史學理論文編》（長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頁 493-502（原錄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第一分（廣州／北平：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28），頁 3-10）；晚近且可能是對於傅氏的宣言最富有同情心的閱讀，參見王汎森，〈重讀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收入許倬雲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七十五周年紀念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4），頁 161-176。

題的焦點由政治轉移到文化再到社會，他們對於中國歷史的概略描述也由「專制主義」變為「儒家霸權」，再到「封建主義」。即使術語不同，他們的修辭卻驚人的一致顯現為單聲調與負面價值。這種思維模式典型採用的語句形式為：「自秦以下中國兩千年來都是……。」錢穆建議克服這種對中國歷史之靜態觀點的辦法是，透過相接續的時代的歷時性比較，強調出每個特定時代的相對分明特徵。因此，《國史大綱》的文本既不是以傳統紀傳風格加以組織（如同章太炎基本上所提議的那樣），也不是區分古代／中古／近代的斷代方式（如同劉師培、夏曾佑或者內藤湖南（1866-1934）所為）。錢氏將整個中國歷史區分為八個部分，並且將每個部分以通俗接受的朝代名稱如秦漢與元明加以命名。然後，對於每個部分，除了慣常課題，譬如政治、經濟、社會等的敘事之外，錢氏還會特意挑選出這個時代的特出性徵，並且就這個特出性徵在整個中國歷史上的意義加以說明。例如，錢氏宣稱秦漢階段在整個中國制度發展上扮演關鍵角色，所以他以文獻表明漢代政體的轉變乃是由「平民政府」轉為「士人政府」。雖然錢氏一再反抗改革派將傳統中國政治貼上專制主義的標籤，但他自己仍然使用「君主專制」一詞作為明代政治相關章節的名稱。就這點而言，我們可以看出，錢穆所批判反對的並不是改革派解釋的本身，而是將這個解釋一體適用到全部中國歷史而成為一種整體化的論述，錢氏對抗這種整體化論述的方式，是指出這個整體中的各個部分的特殊性，並且將改革派夾雜著反動意味的歷史字彙局部化（provincialize）、限定於也可以說賦予特定歷史表現有限的時空區段。嚴格講起來，錢氏反對整體化論述，但是並不否認中國歷史有其各個特殊性區段聯合起來所構成的大體；整部《國史大綱》從講稿到書體的完成，不僅意味著錢氏本人對中國歷史整體看法已趨成熟，此後終錢氏一生並無重大改變，⁵⁸ 除此之外，《國史大綱》的特殊書體更表明，錢氏找到了去表述這個歷史整體的新形式，這個形式在解釋字彙層次上不排除改革派的若干創新，在正文夾註中吸納科學派史料步步為營的作法，⁵⁹ 並且以溫情敬意這樣的語用的情感價值（emotive value）翻轉了現代國民（另一種「新民說」）的構成要件。⁶⁰

質言之，錢穆對於整體化論述方式是內外有別的，他反對在中國歷史內部進行

⁵⁸ 可比較葉龍編錄，《錢穆講中國通史》（香港：香港商務印書館，2017）。

⁵⁹ 關於《國史大綱》屬於綱目變體以及錢氏對相關史撰體例問題的討論，參見嚴耕望，《治史經驗談》（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1），頁 100-105；閻鴻中，〈錢賓四先生對中國傳統史學的詮釋〉，《錢穆先生紀念館館刊》，8（臺北：2000），頁 160-162。

⁶⁰ 此處指的當然是梁啟超的〈新民說〉，關於這篇經典文獻的解讀，請參考 Tang Xiaobing, *Global Space and the Nationalist Discourse of Modernity*, pp. 21-27.

整體化的論述，但是在力圖兼顧中國歷史內部各階段的特殊性之下所構成的中國歷史階段總和，卻逼出了一個與外國史相對的中國歷史整體。這個中國史整體，與唐代以來官方史館修史以斷代為主的國史傳統有所不同，雖然中國本土也不是不存在著像是《資治通鑑》這樣試圖建構歷時性連續體的通史論述，但是錢穆及《國史大綱》的意義，是在形式上拋棄了紀傳與編年兩種主要傳統中國史學體例、改採了晚近輸入的主題式章節鋪陳西方歷史書寫模式，並且在內容上，說明中國——從過去到現在——究竟與西方有何不同而有其傲然存在於這個世上的獨特價值！這個歷史的也是國族的追索在十九世紀中葉之前並非要務，因為傳統中國並未出現過如同現代西方這樣一個軍事政治文化複合體的他者，⁶¹ 更不曾面對這樣一個逼面而來他者的要求中，還包含要對中國複雜文化傳統給出一個整體性相對描述的知識挑戰，⁶² 中國不給，或給的讓他者不滿意，他者就自己做，而他者建構的中國進而回流影響中國人對自己的看法。通常描述中國近代史發展中的器物—制度—文化三階段取法西方說，其實也正可以被倒轉過來理解成西方的三階段要求說，要求作為西方他者的中國給個說法。這個非中國他者的滲透支配，當然不始於錢穆甚至章太炎，清中葉後域外史地的發展、傳教士以及稍後日本媒介之下西方歷史與史學著作的輸入等等，⁶³ 都使得非中國的他者已經進入中國讀書人的「知識本錢」之中，⁶⁴ 這點是毫無疑問的。所以，現代中國史學的第一代與第二代標竿人物都意識到非中國他者的存在，閱讀世界中一定有西洋、或自東洋間接轉手的西方史學作品，不過，回歸到自身的非西方中國通史寫作上，從內容到形式蔚為一家之言的，錢穆的

⁶¹ 最近有學者認為中國民族主義可以追溯到宋代，那是另一回事。Nicolas Tackett, *The Origins of the Chinese Nation: Song China and the Forging of an East Asian World Order* (Cambridge,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

⁶² 自古以來中國周邊的競爭族群政權或文明，亦即他者，一是軍事武力的他者（羌胡蒙滿等），二是政經制度有所不同的他者，三是宗教思想的他者（佛教傳入），晚近才出現綜合前三者之生活文明的他者。許倬雲，《我者與他者：中國歷史上的內外分際》（臺北：時報文化，2009）；楊國強，《衰世與西法：晚清中國的舊邦新命和社會脫榫》（北京：中華書局，2014），〈中國人的歷史經驗和歷史經驗之外的世界〉，頁 25-50。

⁶³ 程天芹，《王先謙的外國史地著作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鄒振懷，《西方傳教士與晚清史學東漸：以 1815 至 1900 年西方歷史譯著的傳播與影響為中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李孝遷，《西方史學在中國的傳播（1882-1949）》（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

⁶⁴ 「知識本錢」這個概念（或譯為「知識倉庫」），晚近由潘光哲在晚清研究上發揚光大。潘光哲，《晚清士人的西學閱讀史（1833-1898）》（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4）。本地最早將「知識本錢 (stock of knowledge)」應用於思想史研究，可能是錢新祖（1940-1996）。錢新祖，〈公案、紫藤與非理性〉，《當代》，26（臺北：1988），頁 18-19。

《國史大綱》當之無愧——他總算用行動回答了與前輩章太炎對話探討的國史未來問題，並且用溫情與敬意置換了晚清以來的仍然認同中國歷史文化知識分子心目中的憤怒與敵意！⁶⁵

可以這麼說，錢穆試圖克服的，乃是改革派將時不我予、世衰道絕的挫折感，以及這種挫折感轉移為對時賢大眾冷嘲熱諷的負面心理。例如，中國歷史上的政治究竟哪一段是專制？甚麼意義下的專制？和西方歷史經驗下產生的專制有何不同？要想釐清這些問題，必須要清楚界定古今中外歷史上的「專制」究竟如何，既不該一口吸進千江水式地整體化全部中國歷史上的政治，也不應在面對眾口鑠金地全盤反傳統論述大潮的時候，怠惰地以同樣整體性的犬儒態度應對，例如章太炎前文提到過「國史已為國人摒棄」的抱怨！就方法論上而言，錢穆相信上述兩方面都是謬誤，而其終極上的成因乃是現代中國史學論述中的西方霸權籠罩支配，也就是說，由西方歷史所衍生出來的發展模式、甚或概念工具，在認知與評價的時候，都被賦予做為普世規範的特權地位。究其質地，這是一個身處於現代全球脈絡中，介於外國史的普世性與本國史的特殊性之間的兩難式，或者在錢穆眼中看來世上只有兩種歷史特殊性：一種叫西方，一種叫中國。⁶⁶ 可是，在錢穆反化約主義式對中國歷史文化進行整體化論述、亦即反西方經驗與概念優位的普遍話語霸權的同時，也有代價要付——他仍然不得不對中國文化進行整體化，而在這種整體化中國歷史文化的同時，也在對照性地整體化建構出一個「虛幻」的西方歷史文化。這使得後《國史大綱》時代的錢穆，從沒有辦法阻止針對他所做中西歷史比較分析進行各種角度的嚴厲批判，⁶⁷ 甚至嘲笑他的西學知識根本是來自東方雜誌的二手傳播，不足為訓！

⁶⁵ 當然，章太炎也不一定只能被動地憤怒，晚近的研究一方面強調章氏思想的普世主義性質，甚至還有學者認為章氏的佛道面向意味著對西方現代性的一種抵抗。Wong Young-tsu, *Beyond Confucian China: The Rival Discourses of Kang Youwei and Zhang Binglin* (Milton Park: Abingdon, Oxon; New York: Routledge, 2010); Viren Murthy, "Equalisation as Difference: Zhang Taiyan's Buddhist-Daoist Response to Modern Politics,"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Asian Studies (IIAS) Newsletter*, 44 (2007), pp. 24-25. Murthy 專著已有中譯，見慕唯仁著，張春田等譯，《章太炎的政治哲學：意識之抵抗》（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8）。

⁶⁶ 在這方面，錢氏直接反對傅斯年的普世主義立場，更批判中國馬克思史家對於歷史唯物主義的公式化斷代劃分的固著。關於與錢穆立場對立的學者們在這議題上看法的分析，參見 Axel Schneider, "Between Dao and History: Two Chinese Historians in Search of a Modern Identity for China," *History and Theory*, 35.4 (1996), pp. 54-73; Susanne Weigelin-Schwiedrzik, "On Shi and Lun: Toward a Typology of Historiography in the PRC," pp. 74-95.

⁶⁷ 例如，張君勱，《中國專制君主政制之評議》（臺北：弘文館，1986）；馬森，《與錢穆先生的對話》（臺北：秀威資訊，2011）。

其實這個問題錢穆自己不會不知道，他的好友、哈佛碩士的中國佛教史專家湯用彤 (1893-1964) 早就委婉提出過建議。根據錢氏自己的證詞，在《國史大綱》著述艱鉅工作完成之後，他思索學術工作的下一步是甚麼，並徵詢友好意見。湯用彤先是建議佛學，但被錢穆以期待君書客套推卻；其次就鼓勵錢氏「改讀英文，多窺西籍，或可為兄學更闢一新途境」。⁶⁸ 湯氏的建議都是著眼於錢氏「國史」觀念的兩大他者而發，一內一外，可謂卓識。⁶⁹ 錢氏後續的確曾在英文書上略下功夫，通讀一部當時通行之世界史英文原本，「余讀此西洋通史原文僅到三分之一，即感大愉快，竟在一年內，此書通讀無遺。此乃余中年以後讀書一新境界，……。」⁷⁰ 如果 1950 年的余英時早知道錢先生這段精讀西洋史書原文的故事，就不會在新亞書院單獨入學考試時目睹錢先生批閱其英文作文而大感驚訝。⁷¹ 錢穆通曉英文，這點在 1890 年代出生且接受清末新式學堂教育的世代之中並不特別，至少梁啟超批評其恩師康有為不懂外語的致命傷不復適用錢穆，問題是通曉外語到甚麼程度，是像梁啟超速成漢字辨識猜讀日文的程度？湯用彤、李濟 (1896-1979) 這種優秀清華留美學生的程度？還是清華留美學生中間少數專攻西洋歷史像蔣廷黻、雷海宗 (1902-1962) 的更高階專業程度？無論如何，沒有證據顯示錢穆的西洋史知識是緊跟著西方學界的發展而同步更新，這點在動亂的二十世紀中國本來能做到的學者就鳳毛麟角，⁷² 但即便如此，也無法掩蓋錢氏在不同課題上所做的中外跨文化比較可能的確過於天真或者根本就是錯誤，更不用說遠遠落後於西洋歷史學界的最新行情。那麼，錢穆為何，尤其是在晚年，還一而再再而三地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呢？我認為，他顯然願意在比較觀點之下，不顧一切地將自己的概念前提暴露出來接受考

⁶⁸ 錢穆，《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合刊·師友雜憶》，〈成都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頁 205。

⁶⁹ 錢穆《師友雜憶》中提及陳寅恪、毛子水、傅斯年、繆鳳林等人對《國史大綱》的反應，我以為皆不及湯用彤深邃透徹、直諒多聞。同前引，〈昆明五華書院及無錫江南大學〉，頁 236-237、240。

⁷⁰ 同前引，〈成都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頁 208。錢先生之後並未走上直接探討西方他者歷史的道路，而決定轉向文化史與文化學的研究，乃有《中國文化史導論》、《文化學大義》等著作。

⁷¹ 余英時，《猶記風吹水上鱗：錢穆與現代中國學術》（臺北：三民書局，1991），〈猶記風吹水上鱗——敬悼錢賓四師〉，頁 4。錢穆會不會英文一直令人好奇，他後來到耶魯講學，大家都知道是用中文，但當時在場的聽眾其實留下更詳實的記載：「錢先生每星期只講一次課，總題是『先秦諸子』，頭一講的大綱是用英文寫的，錢先生慢慢地讀出來。開講之後則用中文，錢先生的無錫話實在不容易聽懂，……。」黃伯飛，〈記錢穆在耶魯講學〉，《中央日報》（臺北），1996 年 10 月 26 日，第 18 頁。

⁷² Crane Brinton (1898-1968) 的 *Ideas and Men* 於 1950 年出版，陶希聖 (1899-1988) 當年 8 月 20 日讀完，考慮到當時的動盪與書籍流通之不易，可謂罕例。陶晉生編，《陶希聖日記：1947-1956》下冊（臺北：聯經出版，2014），頁 621。

驗，這種意願與堅持，使得錢氏的《國史大綱》、以及更重要的，他的（中）國史觀念實踐在現代中國史學之中特立獨行，再沒有人比錢氏更清楚意識到所謂（中）國史與非中國史的差異必須放在檯面上認真看待。這中間蘊含的正是一個或顯或隱的比較觀點，任何一個在中西交流大通之後（尤其今日）講中國史的人都避免不了這個基本定義上的觀點，或顯或隱，只是前景化與自我反思性的程度問題。比較文化觀點與修辭在現代中國史學論述領域中當然並不陌生，⁷³ 章太炎在〈中國通史略例〉中即承認，「東西同狀，文化既進，黃白殊形，必將比較同異，然後優劣自明，原委始見，是雖希臘羅馬印度西臘諸史，不得謂無與域中矣。」⁷⁴ 但是比錢穆早一個世代的章氏自己並未、可能也沒有能力實踐這個「比較同異」，之後隨著現代中國史學專業化的發展，學術紀律的嚴苛，膽敢涉足宏觀歷史文化比較的歷史學者並不多見。⁷⁵ 錢穆毫無疑問地是一位熱情的國族主義者，這裡的國族主義的意思是說他堅持中國過往不應該透過西方他者的語彙加以瞭解。話雖如此，他仍然願意誠實面對在現代中國史學實作之中所被挪用 (appropriated) 的西方觀念範疇，並且透過比較分析使得這些觀念範疇盡可能清楚地明白，錢氏這種追求更高史學自我意識的努力值得重視。

五、結語

正當中國人民對抗日本侵略辛苦掙扎的時候，《國史大綱》的作者也正在大動干戈於另一場煙硝無形的肯認戰爭 (war of recognition)，而且主要還是內戰。如同一位當代思想家所指出，「不肯認或錯誤地肯認會造成傷害，會成為一種壓迫的形式，將人們囚禁在一個虛假、扭曲、與化約的存有模式之中。」⁷⁶ 錢穆正是想要將國人從這個「虛假、扭曲、與化約的存有模式」的牢籠解救出來。可悲的是，對

⁷³ 「比較分析措辭」這個複合概念，並不等同比較歷史這個特定次學科，而是一種比較意識在語言實踐中的表現，出自錢新祖，〈中國的傳統思想與比較分析的「措詞」(rhetoric)〉，《臺灣社會研究季刊》，1.1（臺北：1988），頁 189-208；日本學者則稱之為「比較思想」，可以追溯到明末，參見岡本さえ，《近世中国の比較思想：異文化との邂逅》（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2000）。

⁷⁴ 章太炎，〈中國通史略例〉，轉引自金毓黻，《中國史學史（修訂重排本）》，頁 360。

⁷⁵ 雷海宗是一有趣案例，這位芝加哥大學科班出身的西洋史家，一方面嚴厲批判通俗不加鑑別地引進西方史書，另一方面卻也參與戰國策派學者群體從事的中西比較工作。

⁷⁶ Charles Taylor, "The Politics of Recognition," in David Theo Goldberg (ed.), *Multiculturalism: A Critical Reader* (Oxford: Blackwell, 2004), p. 75. 中文由筆者翻譯。

錢穆而言，這場肯認戰爭不僅是國際間跨文化的反抗，而且還同時是一場更艱辛的國內戰鬥，是中國人不肯認或錯誤認知了他們自己。錢穆國史戰鬥的對象，首先是生活在我們之中的他者，其次才是壓迫我們到快要優勝劣敗的他者（帝國主義侵略者）。錢氏的見識與良心讓他瞭解下面這個事實：中國人對自我歷史的不加肯認或錯誤認知，乃是他們對西方的誤解與錯認的邏輯必然延伸結果。歸根結柢，一個認同的形成，不論是國族的、歷史的或文化的，必然是自我與他者之間辨證衍異的動態過程。如果于連 (François Jullien) 必須要從事一個經過中國他者的同時性迂迴才能到達他的希臘自我，⁷⁷ 那麼，我們也許可以對比性地說，錢穆選擇了一條歷時性的道路，經由已經陌生化的國族過去，希望穿透現代中國被殖民化的虛矯自我，重建真實自我。在錢穆眼中，迫切需要的並不是從國族手中解救歷史，而是從他國族同胞（包含那些極端聰明的國族主義心靈）所建構的歷史之中解救國族特性，而這個國族特性乃是「人類存在的一個自然成分」。⁷⁸

（責任校對：劉思妤）

⁷⁷ François Jullien, *Detour and Access: Strategies of Meaning in China and Greece*, trans. Sophie Hawkes (New York: Zone Books, 2000).

⁷⁸ Gertrude Himmelfarb, "Is National History Obsolete?," in *The New History and the Old: Critical Essays and Reappraisals* (Cambridge, MA: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165.

引用書目

- 〈國史館館長，有內定章太炎說〉“Guoshiguan guanzhang, you neiding Zhang Taiyan shuo”，《申報》（上海）*Shenbao* (Shanghai)，1934 年 4 月 3 日，第 2 張第 8 版。
- 〈章太炎來函〉“Zhang Taiyan lai han”，《申報》（上海）*Shenbao* (Shanghai)，1934 年 10 月 16 日，第 3 張第 10 版。
- 小林武 Kobayashi Takeshi 著，白雨田 Bai Yutian 譯，《章太炎與明治思潮》*Zhang Taiyan yu Mingzhi sichao*，上海 Shanghai：上海人民出版社 Shanghai renmin chubanshe，2018。
- 方光華 Fang Guanghua，〈劉師培評傳〉*Liu Shipai pingzhuan*，南昌 Nanchang：百花洲文藝出版社 Baihuazhou wenyi chubanshe，1996。
- 王汎森 Wang Fan-sen，〈章太炎的思想（一八六八—一九一九）及其對儒學傳統的衝擊〉*Zhang Taiyan de sixiang (1868-1919) ji qi dui ruxue chuantong de chongji*，臺北 Taipei：時報文化 Shibao wenhua，1985。
- ，〈重讀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Chongdu lishi yuyan yanjiusuo gongzuo zhi zhiqu”，收入許倬雲 Hsu Cho-yun 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七十五周年紀念文集》*Zhongyang yanjiuyuan lishi yuyan yanjiusuo qishiwu zhounian jinian wenji*，臺北 Taipei：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Zhongyang yanjiuyuan lishi yuyan yanjiusuo，2004，頁 161-176。
- ，〈近代中國的史家與史學〉*Jindai Zhongguo de shijia yu shixue*，上海 Shanghai：復旦大學出版社 Fudan daxue chubanshe，2010。
- 王 銳 Wang Rui，〈章太炎晚年學術思想研究〉*Zhang Taiyan wannian xueshu sixiang yanjiu*，北京 Beijing：商務印書館 Shangwu yinshuguan，2014。
- 王學典 Wang Xuedian，〈二十世紀中國歷史學〉*Ershi shiji Zhongguo lishixue*，北京 Beijing：北京大學出版社 Beijing daxue chubanshe，2009。
-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 Zhongguo renmin zhengzhi xieshang huiyi 編，〈錢穆紀念文集〉*Qian Mu jinian wenji*，上海 Shanghai：上海人民出版社 Shanghai renmin chubanshe，1992。
- 朱希祖 Zhu Xizu 著，朱倓 Zu Tan、羅香林 Luo Xianglin 編，〈史館論議〉*Shiguan lunyi*，臺北 Taipei：臺灣學生書局 Taiwan xuesheng shuju，1978。

- 余英時 Yü Ying-shih, 《猶記風吹水上鱗：錢穆與現代中國學術》*Youji fengchui shuishang lin: Qian Mu yu xiandai Zhongguo xueshu*, 臺北 Taipei: 三民書局 Sanmin shuju, 1991。
- , 〈文化認同與中國史學——從錢穆先生的國史大綱引論說起〉“Wenhua rentong yu Zhongguo shixue: cong Qian Mu xiansheng de Guoshi dagang yinlun shuoqi”, 收入新亞學術期刊編輯委員會 Xinya xueshu qikan bianji weiyuanhui 編, 《錢賓四先生百齡紀念會學術論文集》*Qian Binsi xiansheng bailing jinianhui xueshu lunwenji*, 香港 Hong Kong: 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 Xianggang Zhongwen daxue xinya shuyuan, 2003, 頁 437-448。
- 余英時 Yü Ying-shih 著, 何俊 He Jun 編, 程嫩生 Cheng Nensheng、羅群 Luo Qun 等譯, 《人文與理性的中國》*Renwen yu lixing de Zhongguo*, 臺北 Taipei: 聯經出版 Lianjing chuban, 2008, 〈20 世紀中國國史概念的變遷〉“20 shiji Zhongguo guoshi gainian de bianqian”, 頁 565-588。
- 吳相湘 Wu Xiangxiang, 《民國百人傳》*Minguo bairen zhuan* 第 4 冊, 臺北 Taipei: 傳記文學出版社 Zhuanji wenxue chubanshe, 1979。
- 杜維運 Tu Wei-yun、黃進興 Huang Ching-hsing 編, 《中國史學史論文選集》*Zhongguo shixueshi lunwen xuanji*, 臺北 Taipei: 華世出版社 Huashi chubanshe, 1976。
- 李孝遷 Li Xiaoqian, 《西方史學在中國的傳播 (1882-1949)》*Xifang shixue zai Zhongguo de chuanbo (1882-1949)*, 上海 Shanghai: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Huadong shifan daxue chubanshe, 2007。
- 李紅岩 Li Hongyan, 《中國近代史學史論》*Zhongguo jindai shixue shilun*, 北京 Beijing: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Zhongguo shehui kexue chubanshe, 2011。
- 李祚明 Li Zuoming, 〈「國立檔案總庫」與「國史館」〉“‘Guoli dang’an zongku’ yu ‘Guoshiguan’”, 《檔案與建設》*Dang’an yu jianshe*, 3, 南京 Nanjing: 1988, 頁 55-58。
- 李 埏 Li Yan、李伯重 Li Bozhong, 《良史與良師：學生眼中的八位著名學者》*Liangshi yu liangshi: xuesheng yanzhong di bawei zhuming xuezhe*, 北京 Beijing: 清華大學出版社 Qinghua daxue chubanshe, 2012。
- 李朝津 Li Chiu-chun, 《中國近代民族史學探源》*Zhongguo jindai minzu shixue tanyuan*, 臺北 Taipei: 蘭臺出版社 Lantai chubanshe, 2014。
- 汪榮祖 Wang Rong-zu, 《章太炎研究》*Zhang Taiyan yanjiu*, 臺北 Taipei: 李敖出版社 Li Ao chubanshe, 1991。

- _____, 《槐聚心史：錢鍾書的自我及其微世界》 *Huaiju xinshi: Qian Zhongshu de ziwo ji qi weishijie*, 臺北 Taipei：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Guoli Taiwan daxue chuban zhongxin, 2014。doi: 10.6327/NTUPRS-9789863500230
- 沈松僑 Shen Sung-chiao, 〈我以我血薦軒轅——黃帝神話與晚清的國族建構〉“Wo yi wo xie jian Xuanyuan: Huangdi shenhua yu wan Qing de guozu jiangou”, 《臺灣社會研究季刊》 *Taiwan shehui yanjiu jikan*, 28, 臺北 Taipei：1997, 頁 1-77。doi: 10.29816/TARQSS.199712.0001
- 周康燮 Zhou Kangxie 編, 《章炳麟傳記彙編》 *Zhang Binglin zhuanji huibian*, 香港 Hong Kong：大東圖書公司 Dadong tushu gongsi, 1978。
- 金毓黻 Jin Yufu, 《中國史學史（修訂重排本）》 *Zhongguo shixue shi (xiuding zhongpaiben)*, 臺北 Taipei：鼎文出版社 Dingwen chubanshe, 1985。
- 倉石武四郎 Kuraishi Takeshiro 著, 榮新江 Rong Xinjiang、朱玉麒 Zhu Yuqi 譯, 《倉石武四郎中國留學記》 *Cangshi Wusilang Zhongguo liuxue ji*, 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 2002。
- 袁英光 Yuan Yingguang, 〈中國古代史〉“Zhongguo gudai shi”, 收入倉修良 Osamu Kura 編, 《中國史學名著評介》 *Zhongguo shixue mingzhu pingjie* 第 3 冊, 臺北 Taipei：里仁書局 Liren shuju, 1994, 頁 299-324。
- 馬 森 Ma Sen, 《與錢穆先生的對話》 *Yu Qian Mu xiansheng de duihua*, 臺北 Taipei：秀威資訊 Xiuwei zixun, 2011。
- 陶晉生 Tao Jinsheng 編, 《陶希聖日記：1947-1956》 *Tao Xisheng riji: 1947-1956* 下冊, 臺北 Taipei：聯經出版 Lianjing chuban, 2014。
- 張君勱 Zhang Junmai, 《中國專制君主政制之評議》 *Zhongguo zhuanzhi junzhu zhengzhi zhi pingyi*, 臺北 Taipei：弘文館 Hongwen guan, 1986。
- 張耕華 Zhang Genghua, 《人類的祥瑞：呂思勉傳》 *Renlei de xiangrui: Lü Simian zhuan*, 上海 Shanghai：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Huadong shifan daxue chubanshe, 1998。
- 張 越 Zhang Yue, 〈近代新式中國史撰述的開端——論清末中國歷史教科書的形式與特點〉“Jindai xinshi Zhongguoshi zhuan shu de kaiduan: lun Qingmo Zhongguo lishi jiaokeshu de xingshi yu tedian”, 《南開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Nankai xuebao (zhexue shehui kexue ban)*, 4, 天津 Tianjin：2008, 頁 74-80。
- 梁啟超 Liang Qichao, 《飲冰室合集》 *Yinbingshi heji*, 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 1989。
- 章太炎 Zhang Taiyan, 〈答張季鸞問政書〉“Da Zhang Jiluan wenzheng shu”, 《制言》 *Zhiyan*, 24, 上海 Shanghai：1936, 頁 1-2。

- _____, 《章太炎全集》 *Zhang Taiyan quanji* 第3冊, 上海 Shanghai: 上海人民出版社 Shanghai renmin chubanshe, 1982。
- 章太炎 Zhang Taiyan 著, 湯志鈞 Tang Zhijun 編, 《章太炎政論選集》 *Zhang Taiyan zhenglun xuanji*, 北京 Beijing: 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 1977。
- 章念馳 Zhang Nianchi, 《我所知道的祖父章太炎》 *Wo suo zhidao de zufu Zhang Taiyan*, 臺北 Taipei: 聯經出版 Lianjing chuban, 2016。
- 許倬雲 Hsu Cho-yun, 《我者與他者: 中國歷史上的內外分際》 *Wozhe yu tazhe: Zhongguo lishi shang de neiwai fenji*, 臺北 Taipei: 時報文化 Shibao wenhua, 2009。
- 許師慎 Xu Shi-shen 編, 《國史館紀要(初稿)》 *Guoshiguan jiyao (chugao)*, 臺北 Taipei: 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 Zhonghuaminguo shiliao yanjiu zhongxin, 1978。
- 陳業東 Chen Yedong, 《夏曾佑研究》 *Xia Zengyou yanjiu*, 澳門 Macao: 澳門近代文學學會 Aomen jindai wenxue xuehui, 2001。
- 黃伯飛 Huang Bofei, 〈記錢穆在耶魯講學〉“Ji Qian Mu zai Yelu jiangxue”, 《中央日報》(臺北) *Zhongyang ribao (Taipei)*, 1996年10月26日, 第18頁。
- 黃俊傑 Huang Chun-chieh, 《儒家思想與中國歷史思維》 *Rujia sixiang yu Zhongguo lishi siwei*, 臺北 Taipei: 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Guoli Taiwan daxue chuban zhongxin, 2014。doi: 10.6327/NTUPRS-9789863500476
- 葉 龍 Ye Long 編錄, 《錢穆講中國通史》 *Qian Mu jiang Zhongguo tongshi*, 香港 Hong Kong: 香港商務印書館 Xianggang shangwu yinshuguan, 2017。
- 傅斯年 Fu Sinian, 〈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Lishi yuyan yanjiusuo gongzuo zhi zhiqu”, 收入蔣大椿 Jiang Dachun 編, 《史學探淵: 中國近代史學理論文編》 *Shixue tanyuan: Zhongguo jindai shixue lilun wenbian*, 長春 Changchun: 吉林教育出版社 Jilin jiaoyu chubanshe, 1991, 頁493-502。
- 傅樂成 Fu Yuecheng, 《傅孟真先生年譜》 *Fu Mengzhen xiansheng nianpu*, 臺北 Taipei: 文星書店 Wenxing shudian, 1964。
- 湯志鈞 Tang Zhijun, 〈章太炎的社會學〉“Zhang Taiyan de shehuixue”, 收入章念馳 Zhang Nianchi 編, 《章太炎生平與學術》 *Zhang Taiyan shengping yu xueshu*, 北京 Beijing: 三聯書店 Sanlian shudian, 1988, 頁532-542。
- 湯志鈞 Tang Zhijun 編, 《章太炎年譜長編(增訂本)》 *Zhang Taiyan nianpu changbian (zengding ben)*, 北京 Beijing: 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 2013。
- 程天芹 Cheng Tianqin, 《王先謙的外國史地著作研究》 *Wang Xianqian de waiguo shidi zhuozuo yanjiu*, 北京 Beijing: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Zhongguo shehui kexue chubanshe, 2016。

- 楊國強 Yang Guoqiang, 《衰世與西法：晚清中國的舊邦新命和社會脫樑》 *Shuaishi yu xifa: wan Qing Zhongguo de jiubang xinming he shehui tuosun*, 北京 Beijing: 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 2014。
- 楊舒眉 Yang Shumei, 〈1900-1915 年間的中國通史編纂〉“1900-1915 nian jian de Zhongguo tongshi bianzuan”, 《齊魯學刊》 *Qilu xuekan*, 218, 濟南 Jinan: 2010, 頁 43-47。
- 萬仕國 Wan Shiguo, 《劉師培年譜》 *Liu Shipai nianpu*, 揚州 Yangzhou: 廣陵書社 Guangling shushe, 2003。
- 葛兆光 Ge Zhaoguang, 《宅茲中國：重建有關「中國」的歷史論述》 *Zhaizi Zhongguo: chongjian youguan 'Zhongguo' de lishi lunshu*, 臺北 Taipei: 聯經出版 Lianjing chuban, 2011。
- 賈紅霞 Jia Hongxia, 〈民國時期金毓黻在國史館的修史活動述論〉“Minguo shiqi Jin Yufu zai Guoshiguan de xiushi huodong shulun”, 《史學理論與史學史學刊》 *Shixue lilun yu shixueshi xuekan*, 1, 北京 Beijing: 2017, 頁 245-259。
- 鄒振懷 Zou Zhenhuai, 《西方傳教士與晚清史學東漸：以 1815 至 1900 年西方歷史譯著的傳播與影響為中心》 *Xifang chuanjiaoshi yu wan Qing shixue dongjian: yi 1815 zhi 1900 nian xifang lishi yizhu de chuanbo yu yingxiang wei zhongxin*, 上海 Shanghai: 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 2007。
- 趙梅春 Zhao Meichun, 《二十世紀中國通史編纂研究》 *Ershi shiji Zhongguo tongshi bianzuan yanjiu*, 北京 Beijing: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Zhongguo shehui kexue chubanshe, 2007。
- 劉永祥 Liu Yongxiang, 〈民國時期國史館的變遷〉“Minguo shiqi Guoshiguan de bianqian”, 《學術研究》 *Xueshu yanjiu*, 2, 廣州 Guangzhou: 2015, 頁 119-124。
- 劉俐娜 Liu Lina, 《由傳統走向現代：論中國史學的轉型》 *You chuantong zouxiang xiandai: lun Zhongguo shixue de zhuanxing*, 北京 Beijing: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Shehui kexue wenxian chubanshe, 2006。
- 劉師培 Liu Shipai, 《劉申叔先生遺書》 *Liu Shenshu xiansheng yishu* 第 4 冊, 臺北 Taipei: 華世出版社 Huashi chubanshe, 1975。
- 劉師培 Liu Shipai 著, 萬仕國 Wan Shiguo 點校, 《中國歷史教科書》 *Zhongguo lishi jiaokeshu*, 揚州 Yangzhou: 廣陵書社 Guangling shushe, 2013。
- 劉龍心 Liu Longxin, 《學術與制度：學科體制與現代中國史學的建立》 *Xueshu yu zhidu: xueke tizhi yu xiandai Zhongguo shixue de jianli*, 臺北 Taipei: 遠流出版 Yuanliu chuban, 2002。

- 慕唯仁 Viren Murthy 著，張春田 Zhang Chuntian 等譯，《章太炎的政治哲學：意識之抵抗》*Zhang Taiyan de zhengzhi zhaxue: yishi zhi dikang*，上海 Shanghai：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Huadong shifan daxue chubanshe，2018。
- 潘光哲 Pan Kuang-che，《晚清士人的西學閱讀史 (1833-1898)》*Wan Qing shiren de xixue yuedushi (1833-1898)*，臺北 Taipei：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Zhongyang yanjiuyuan jindaishi yanjiusuo，2014。
- 錢新祖 Qian Xinzu，〈中國的傳統思想與比較分析的「措詞」(rhetoric)〉“Zhongguo de chuantong sixiang yu bijiao fenxi de ‘cuoci’ (rhetoric)”，《臺灣社會研究季刊》*Taiwan shehui yanjiu jikan*，1.1，臺北 Taipei：1988，頁 189-208。doi: 10.29816/TARQSS.198802.0008
- ，〈公案、紫藤與非理性〉“Gongan, ziteng yu feilixing”，《當代》*Dangdai*，26，臺北 Taipei：1988，頁 18-19。
- 錢 穆 Qian Mu〈對於章太炎學術的一個看法〉“*Duiyu Zhang Taiyan xueshu de yi ge kanfa*”，《史學消息》*Shixue xiaoxi*，1.3，北京 Beijing：1936，頁 2-7。
- ，〈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合刊〉*Bashi yi shuangqin shiyou zayi hekan*，臺北 Taipei：東大圖書 Dongda tushu，1983。
- ，〈錢賓四先生全集〉*Qian Binsi xiansheng quanji*，臺北 Taipei：聯經出版 Lianjing chuban，1998。
- 閻鴻中 Yen Hung-chung〈錢賓四先生對中國傳統史學的詮釋〉“Qian Binsi xiansheng dui Zhongguo chuantong shixue de quanshi”，《錢穆先生紀念館館刊》*Qian Mu xiansheng jinian guan guankan*，8，臺北 Taipei：2000，頁 148-167。
- 羅志田 Luo Zhitian，《近代中國史學十論》*Jindai Zhongguo shixue shilun*，上海 Shanghai：復旦大學出版社 Fudan daxue chubanshe，2003。
- 嚴耕望 Yan Gengwang，《治史經驗談》*Zhishi jingyantao*，臺北 Taipei：臺灣商務印書館 Taiwan shangwu yinshuguan，1981。
- ，〈治史答問〉*Zhishi dawen*，臺北 Taipei：臺灣商務印書館 Taiwan shangwu yinshuguan，1985。
- ，〈錢穆傳〉“Qian Mu zhuan”，《國史館館刊》*Guoshiguan guankan*，17，臺北 Taipei：1994，頁 193-208。
- 顧頡剛 Gu Jiegang 編，《古史辨》*Gushi bian* 第 1 冊，北京 Beijing：樸社 Pushe，1926。
- 岡本さえ Okamoto Sae，《近世中国の比較思想：異文化との邂逅》*Kinsei Chūgoku no hikaku shisō: i bunka to no kaigō*，東京 Tokyo：東京大学出版会 Tokyo daigaku shuppankai，2000。

- 島田虔次 Shimada Kenji, 《中国革命の先駆者たち》 *Chūgoku kakumei no senkushatachi*, 東京 Tokyo: 筑摩書房 Chikuma shobō, 1965。
- Bernal, Martin. "Liu Shi-P'ei and National Essence," in Charlotte Furth (ed.), *The Limits of Change: Essays on Conservative Alternatives in Republican Chin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pp. 90-112.
- Bevernage, Berber and Nico Wouters (eds.). *The Palgrave Handbook of State-Sponsored History after 1945*.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8. doi: 10.1057/978-1-349-95306-6
- Chen Hsi-yuan. "Last Chapter Unfinished: The Making of the official Qing History and the Crisi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Historiography," *Historiography East and West*, 2.2, 2004, pp. 173-204. doi: 10.1163/157018606779068306
- Dennerline, Jerry. *Qian Mu and the World of Seven Mansion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8.
- Duara, Prasenjit. *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 Questioning Narratives of Modern Chin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doi: 10.7208/chicago/9780226167237.001.0001
- Himmelfarb, Gertrude. "Is National History Obsolete?," in *The New History and the Old: Critical Essays and Reappraisals*. Cambridge, MA: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121-142.
- Jullien, François. *Detour and Access: Strategies of Meaning in China and Greece*, trans. Sophie Hawkes. New York: Zone Books, 2000.
- LaCapra, Dominick. *Writing History, Writing Trauma*.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1.
- Murthy, Viren. "Equalisation as Difference: Zhang Taiyan's Buddhist-Daoist Response to Modern Politics,"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Asian Studies (IIAS) Newsletter*, 44, 2007, pp. 24-25.
- Schneider, Axel. "Between Dao and History: Two Chinese Historians in Search of a Modern Identity for China," *History and Theory*, 35.4, 1996, pp. 54-73. doi: 10.2307/2505444
- Schneider, Laurence A. *Ku Chieh-Kang and China's New History: Nationalism and the Quest for Alternative Tradition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1.
- Tackett, Nicolas. *The Origins of the Chinese Nation: Song China and the Forging of an East Asian World Order*. Cambridge,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 doi: 10.1017/9781108164917

- Tang Xiaobing. *Global Space and the Nationalist Discourse of Modernity: The Historical Thinking of Liang Qichao*.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 Taylor, Charles. "The Politics of Recognition," in David Theo Goldberg (ed.), *Multiculturalism: A Critical Reader*. Oxford: Blackwell, 2004, pp. 25-73.
- Wang Fan-sen. *Fu Ssu-Nien: A Life in Chinese History and Politics*. Cambridge,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doi: 10.1017/CBO9780511529191
- Wang, Q. Edward (王晴佳). "China's Search for National History," in Q. Edward Wang and Georg G. Iggers (eds.), *Turning Points in Historiography: A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 Rochester: University of Rochester Press, 2002, pp. 185-208.
- _____. *Inventing China through History: The May Fourth Approach to Historiography*.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1.
- Weigelin-Schwiedrzik, Susanne. "On Shi and Lun: Toward a Typology of Historiography in the PRC," *History and Theory*, 35.4, 1996, pp. 74-95. doi: 10.2307/2505445
- Wong Young-tsu. *Beyond Confucian China: The Rival Discourses of Kang Youwei and Zhang Binglin*. Milton Park: Abingdon, Ox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10.
- _____. *Search for Modern Nationalism: Zhang Binglin and Revolutionary China, 1869-1936*.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 Yeh Wen-hsin (葉文心). *The Alienated Academy: Culture and Politics in Republican China, 1919-1937*.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distributed b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 Yü Ying-shih. "Changing Conceptions of National History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in Erik Lönnroth, Karl Molin and Ragnar Björk (eds.), *Conceptions of National History*.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1994, pp. 155-174.

***Guoshi* or National History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iography: From Zhang Taiyan to Qian Mu**

Sung Chia-fu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cfsung@ntu.edu.tw

ABSTRACT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a conversation that took place in the 1930s between Zhang Taiyan 章太炎 (1869-1936) and Qian Mu 錢穆 (1895-1990), two intellectuals who had become known as Masters of National Learning in their long-lasting and outstanding academic careers. They did not meet each other either before or after this event. Despite the fact that both shared a concern for the future of China's historiography, they differed greatly on their idea of what *guoshi* 國史 ought to be as well as how it should be practiced. Their different views can be attributed to their ages, career paths, and the dramatic change in cultural atmosphere lying between their generations. Most importantly, their divergent conceptions reflect their diversified view of Chinese national history and its relationship to its non-Chinese others. A more complicate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between not only China and the West but also ancient versus modern has quietly emerged (and is also submerged) in the discourse and practice of writing national history in modern China. The traditional struggle with the governmental sanction of Standard History has been transformed into a war of recognition that is at once both domestic and foreign.

Key words: national history, war of recognition, transference, totalization, general history of China, historiography

(收稿日期：2018. 8. 30；修正稿日期：2018. 11. 2；通過刊登日期：2018. 11. 28)

